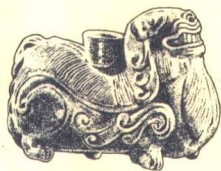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
研究生院教材

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

萧楚父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 史料源流举要

萧蓬父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萧蓬父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5

ISBN 7-307-02472-1

I 中…

II 萧…

III 哲学史—史料—历史—中国

IV B2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珞珈山)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印刷

(430033 武汉市硚口区营南小区 8 号楼)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97 千字 印数: 1 ~ 3000

ISBN 7-307-02472-1/B·56 定价: 13.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并 言

这是一本可供文科研究生试用的教材或自学参考书。

80年代以来,我为武汉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的历届研究生开设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课。由于常有文科其他系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也来选修或旁听,为照顾听课的对象,在讲授中不免适当扩充内容,以介绍哲学史料为中心而往往涉及其他文史知识;更由于中国古代学术尚未分化,哲学史料往往混杂于其他非哲学的学术资料之中,需经鉴别、筛选和考订,才能清理出来,因而本课不可能单是介绍现成史料,而必须考索源流,辨析真伪,故其内容近于目录学、校讎学、文献学、史源学之综合。

本课经多次讲授,初拟讲纲,后写成讲义,再打印发给学员,最后修订成为此书。本书在教学实践中积累而成,仍保留讲义形式,从古到今,分十二讲,自为经纬,纲举目张。如用作教材,大体适应一学期每周4学时的授课,并注意到将一些论述仅标出一定体例,便于讲授者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本书内容如有某些特点,除上述在清理、评介史料中注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外,主要还表现在论述中熔铸了较丰富的文史考古知识,并特别注意评介“五四”以来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使研究生继踵前修,尽快地进入学术前沿;同时,特别强调义必征实,言必有据,提倡严谨笃实的学风。

本书其所以题名《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因中国哲学文化史料之繁富,可谓浩瀚无涯;其源流考辨也异说纷纭,难以穷举。这本小书只能是一斑窥豹,略举其要而已。一些问题虽有所引发,

而浚求博证则只能寄希望于来者。

本书第十二讲“近现代哲学史料”由李维武教授执笔，谨志心感。

本书附录的两篇拙文：（一）《略论杨泉的物理论》，从目录学入手，由辨析《物理论》诸家辑本的佚文异同而考论其哲学思想的历史定位；（二）《〈推十书〉影印本序》，藉序录久被历史灰尘湮没了的《推十书》，对蜀中天才学者刘鉴泉的学术贡献作了评介。旨在以此作为发掘史料，辨章学术之一例，聊供“闻一知十”的参考。

1996年10月萧蓬父题于珞珈山麓

目 录

弁 言	1
第一讲 引论	1
一、明确本课要旨	1
二、珍视优良传统	5
三、正确对待民族文化遗产	12
第二讲 古史祛疑	14
一、问题的提出	14
二、从考古新发现看我国文明史的开端	18
三、我国奴隶制形成的历史特点及其在古文献中的反映	27
第三讲 朴学简介	38
一、朴学源流	38
二、关于语言学	40
三、关于目录学	43
四、关于版本学	49
五、关于校勘学	50
六、关于辨伪学	53
七、关于辑佚学	55
八、关于工具书	57
九、余论	60

第四讲 原始文字与古史文献举要	61
一、地下考古的文字资料	61
二、关于传世的古史文献	65
三、一些关于古史的旁证材料	70
第五讲 周秦之际哲学史料(上)	76
一、《周易》与早期阴阳家言	76
二、《论语》与先秦儒家言	105
三、《墨子》与先秦墨家言	114
四、《老子》与先秦道家言	118
第六讲 周秦之际哲学史料(下)	131
五、《管子》与先秦法家言	131
六、《邓析子》与先秦名家言	139
七、《孙子》与先秦兵家言	142
八、关于先秦诸子的通考名著	144
第七讲 秦汉哲学史料	147
一、时代特点及思想动向	147
二、秦汉之际的三种思潮	148
三、秦汉之际的自然科学思潮	157
四、王充及汉末社会批判思潮	161
五、原始道教史料	163
第八讲 魏晋南北朝哲学史料	166
一、时代特点和思想阵线	166
二、玄学思潮	167
三、反玄学思潮	175

四、佛教兴盛与反佛思潮	177
五、道教与科学文献	181
六、美学与文艺批评	182
第九讲 隋唐五代哲学史料	183
一、时代特点和思想气度	183
二、总集性史料举要	184
三、唐初无神论思潮	186
四、儒学正宗与史学巨擘	188
五、道教理论著作	193
六、佛教哲学论著	199
七、晚唐五代批判思潮	208
第十讲 宋元明哲学史料	212
一、时代特点	212
二、哲学特点	213
三、史料举要	214
第十一讲 明清之际哲学史料	234
一、总集性著作	235
二、明末清初道学余波的史料	235
三、清初反道学思潮的史料	237
四、18 世纪汉学家著作中的哲学史料	244
五、17、18 世纪自然科学家的著作	249
六、耶稣会士来华译著	252
第十二讲 近现代哲学史料	255
上篇 19 世纪中国哲学史料	256
一、综合性资料	256

二、个案性资料	257
下篇 20 世纪中国哲学史料	265
一、综合性资料	266
二、专题性资料	270
三、科学主义思潮	273
四、人文主义思潮	289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	312
六、国民党哲学思潮	325
七、现代佛学思潮	330
 附 录	 336
一、略论杨泉的《物理论》	336
二、《推十书》影印本序	351

第一讲 引 论

任何科学，都必须以实践经验、实证材料作为基础，历史科学尤其如此。史料的广泛搜集、真伪鉴别、源流考辨、诠释合度，成为历史科学的前提。马克思认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恩格斯也强调：“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① 历史科学的研究，第一步就是充分地占有历史资料，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各种史料的源流衍变。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尚在建设中的科学，史料的搜集、发掘、考订和编纂，更具有首要的迫切性。“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一课，正适应了这一迫切的需要。

一、明确本课要旨

本课不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名，而称之为“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其内容主要是：以中国历代哲学思想资料及有关史料为对象，序列文献，综述目录，介绍研究成果，考辨学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第118页。

源流，近于目录学、校讎学、文献学、史源学之综合，系综合性的专业基础课。

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文献学家陈垣（援庵，1880—1971年）创立“史源学”。30—40年代，他先后为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创设“史源学实习”（先名“史源学研究”）一课。其讲授方法别具一格：以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全祖望的《鲒埼亭集》或顾炎武的《日知录》为教材，每周各选其一篇，先由学生楷抄点句，将文中人名、史事出处一一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然后由陈先生主持课堂讨论，并要求学生将所考释出者缀拾为文，交其批改。陈先生自写了许多史源学短文，现出版的《陈垣史源学杂文》所收者凡三十篇，《陈垣学术论文集》也收了一部分。陈垣先生是我国近代以来继承乾嘉朴学传统而成就最大的学者，他把追寻史源作为考证的首要环节。“史源学”的宗旨，在于使学生通过“一一追寻其史源，考证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①。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为了确切把握各时代哲学家思想的承先启后的关系，也需要对各种哲学史史料进行一番史源学的探究。

目录学是关于图书分类编目，以及揭示文献内容、考辨学术源流、指引治学门径的学问。我国的目录学源远流长。西汉成、哀之时，刘向、刘歆父子负责整理图书，著《别录》、《七略》，班固继之撰成《汉书·艺文志》，总结了我国自先秦以来类别学术、序录典籍、编次书目的经验，把“目”与“录”结合起来，不仅条列群书篇目，而且校勘定本，编写叙录，辨别真伪，考订源流等，开我国目录学之端绪。自此之后，历代正史均有《艺文志》、《经籍志》等，直到清代最大的官藏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历代史志目录以及官私专修目录接踵而出。北宋时，已出现“目录学”的专称，苏象先的《苏魏公谭训》即有“目录之学”的提法。

^① 《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

南宋已有目录学的专论问世，如郑樵的《通志·校讎略》。到清代，目录学极受学者的重视。王鸣盛（西庄，1722—1797年）著《十七史商榷》，把目录学当做最要紧的入门之学。他说：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①

“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②

他著《蛾术篇》一书，以“说录”列于书首，继之以“说字”、“说地”、“说人”、“说物”、“说制”、“说集”、“说通”诸类，贯彻他的目录学思想。与王鸣盛约略同时的著名史评家、史学家章学诚^③，对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章氏推崇郑樵^④，自认为继承了郑樵的学脉。他撰著《文史通义》，中有“释通”、“申郑”诸篇，盛赞郑樵的史学卓识。又著《校讎通义》，发挥郑樵的目录学思想。郑樵是南宋著名的史学家，一生僻居夹漈山。其为学讲求博通，曾自述心志：“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⑤他搜奇访古，无书不读，又“与田夫野老往来”^⑥，学识渊博，著述甚多，自言“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⑦。他撰述《通志》二百卷，纪、传、谱、略俱全，上自三皇五帝，下自隋唐北宋，纵贯几千年，横及各领域，是一部少有的文化史巨著，与唐代杜佑的《通典》、南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三通”，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郑樵认为史家要“通前代之史”，“会天下之书”^⑧，自称其《通志》二十

① 《十七史商榷》卷一。

② 同上，卷七。

③ 实斋，1738—1801年。

④ 渔仲，1104—1162年。

⑤ 《夹漈遗稿》卷中《献皇帝书》。

⑥ 《通志·昆虫草木略》。

⑦ 《夹漈遗稿·上宰相书》。

⑧ 同上。

《略》“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① 历代学者都认为，二十《略》为《通志》之精华所在，特别是其中的《校讎略》，成为我国目录学史上第一篇有关目录学、校讎学的专论。在此文中，郑樵阐述了图书分类、编目、著录、注释的原则，强调了分清图书类例、揭示学术源流的重要性。他说：“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因为，“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② 反之，“学问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③ 这些论述，反映了他的“类例既分，学术自明”^④的宗旨。章学诚继承并发展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他所著的《校讎通义》，借校讎学之名，主要阐述目录学之义，把目录学的宗旨进一步凝炼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⑤，目的在于“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⑥。这是治学的唯一门径，“古人著书，苟欲推明大道，未有不辨诸家学术源流。”^⑦ 他还集浙东史学之大成，主修《史籍考》三百二十五卷，将史籍分为十二类，五十五目，并在《编修史籍考要略》中定校讎原则为十五项：“古逸宜存，家法宜辨，剪裁宜法，逸篇宜采，嫌名宜辨，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方志宜选，谱牒宜略，考异宜精，版刻宜详，制书宜尊，禁例宜明，采摭宜详。”《史籍考》一书没有刻印，据朱谦之先生说，手稿现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我国目录学发展到章学诚，明确了以著录部次、辨章学术、考

① 《通志·总序》。

② 以上见《通志·校讎略》。

③ 《通志·总序》。

④ 《通志·校讎略》。

⑤ 《校讎通义·原道》。

⑥ 《校讎通义·互著》。

⑦ 《校讎通义·汉志诸子》。

镜源流、指引治学门径为其主要内容和功用，这就体现了自刘氏父子以来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和特点。“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一课，其主旨亦近于此——叙列中国哲学史史料之目录，考辨中国哲学学术之源流；其方式是以纲带目，略举其要。

二、珍视优良传统

学好这门课并善于学以致用，需要有历史的自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历史感的民族，不仅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且有撰修历史、整理文献的优良传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历史文献之丰富，历史记载之翔实，历史纪年之不断，实属举世无双，堪称独步。

我国素有史官的设置。随着远古第一次体脑分工而出现的知识分子，既是“巫”，也是“史”。因此我国古籍中常“巫史”并称。“史”字古作“𠄎”、“𠄎”，像人手执简秉笔之状。这种以手执简、秉笔记录的人就叫做“史”。史官的职守就是记言记事，汇编历史文献。《汉书·艺文志》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说明了史官和历史文献的关系。史官的出现可追溯到传说中远古的轩辕黄帝时代。汉代宋衷的《世本注》说沮诵、仓颉为黄帝的左右史官。其后，夏有太史终古，商有太史向挚。《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周时，史官进一步分化为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春秋时期著名的周太史有史佚、史伯（伯阳父）、苾弘、老聃等，都是知识渊博的学者。除了周王的史官外，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史官。由于史官记言记事，汇编成册，结果典籍日益浩繁。左丘明记载，楚国左史倚相能诵“三坟”、“五典”、“八索”、“九丘”^①。《墨子》亦有

① 见《左传》昭公廿年。

“孔子观书于周，得百二十国宝书”之说。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各国编修历史提供了条件。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各国都有自己的编年史，晋曰《乘》，秦曰《记》，楚曰《杻机》，鲁及其他各国谓之《春秋》，《墨子》综称为“百国《春秋》”。典籍的不断增多，也就产生了整理的必要性。孔子是第一个自觉整理文献的人，在这方面他有贡献，但也有较大的局限，可说是功过参半。一方面，经过他的整理，保存了《诗》、《书》、《易》、《礼》、《乐》、《春秋》等珍贵史料；另一方面，他从“周公之典”的正统观点出发，也删去了大量的史料。孔子删《书》，断自唐虞，把三千多篇删为一百篇。《诗》原有三千多篇，也被删为三百零五篇。这么多的史籍被删佚，给后人了解古史造成诸多困难，殊属憾事。

孔子时代，“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学术开始下移，私家著述兴起。战国时期，学派竞出，处士横议，百家争鸣，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致有《墨子》所谓“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的盛况；《庄子》亦有惠施“其书五车”的记载。在学派蜂起、专著林立的基础上，出现了评判各家得失的总结性专论，如《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和《解蔽》、《尸子》的《广泽篇》等。同时，还出现了各学派的自编丛书，如《管子》、《庄子》、《墨子》等，分别是管仲学派、庄周学派和墨翟学派各自的丛书。此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文化典籍始遭厄运，但公私藏书仍然不少。汉兴之初，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广求亡书于天下，从中央到地方各诸侯都非常重视图书典籍的收藏。河间献王刘德、淮南王刘安等均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汉王朝还建立了皇家图书馆，如西汉的温室、天禄阁、石渠阁及东汉的石室、兰台；并建立史官，如西汉的太史令及东汉的兰台令史。图书馆收藏图书、整理文献；史官“撰集新纪”^①，编修国史。从此，修史和整理图书被定为国家制度，成

^① 《七录序》。

为代代相续的传统。

汉初，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累世网罗天下遗文古事，首创通史范式。《论六家要旨》是第一部学术思想成果的史的总结；而一部《史记》，“断自轩皇，逮于孝武”^①，总括了我们民族的前三千年的历史。从此以后，修史传统代代相续，历代官修正史计有二十六部之多。同时，继汉初陆贾首著《楚汉春秋》之后，私家著史也代不乏人。据统计，修汉史者有十三家，修三国史十五家，修晋史二十三家，修五胡十六国史三十家，修南北朝史三十五家。唐宋之后，纪传体、典志体、纪事本末体等各种体裁的私史不断出现，互竞短长，产生了不少辉煌巨著。值得提出的是，我们民族的修史传统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注意对域外史事的记载。《史记》中有匈奴、朝鲜、大宛、康居、乌孙、奄蔡、大月氏、安息等国列传。特别是《明史》，载有一百二十多国的史料。私家史书中，法显的《佛国记》、慧超的《往五天竺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等，明代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都是有关外国历史的著作。此外，我们民族还注意学术思想史的撰述。司马谈一篇《论六家要旨》，言简意赅，总结了先秦诸流派，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批评的哲学史论。从此以后，撰修学术史、思想史也成为传统，直到明清时期，产生了《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学案小识》等学术史名著。总之，从朝廷修撰到私家著述，从国史到学术思想史，历数千年从未中断，充分体现了我们民族高度重视修史的优良传统。

我们民族还素有重视文献整理的优良传统。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奉旨邀集专家，校勘图书，开创了我国由国家统一安排，全面、系统地整理文献的先河。汉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

^① 《隋书·经籍志总序》。

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①这里概述了刘氏向、歆父子整理文献的经过。一书校毕，刘向便为之编次篇目，撰写一篇内容提要，“论其指归，辨其讹谬”^②，谓之“叙录”；多篇“叙录”汇集起来，编成《别录》，共二十卷。刘歆以《别录》为基础作成一部图书总目，名为《七略》，共七卷。班固继刘氏父子之后，吸收《别录》、《七略》成果，著成《汉书·艺文志》。刘氏之文虽已亡佚，但后人从班《志》中仍可窥见其大略。《七略》把当时的文献三万三千零九十卷分为六类，总以《辑略》概括之，首创我国目录学分类、编目、辨章学术源流之例。

目录学包括书籍分类、学术分科、思想分派，这在先秦稍已萌芽，至两汉则首具模式。学术分科始自孔子，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不及著述；孔子之后，《孟子》分天下学术思想为杨、墨、儒三派；《庄子》的《天下篇》实分为八派，《荀子》的《非十二子》、《天论》和《解蔽》，《韩非子》的《显学》，《尸子》的《广泽》，《吕氏春秋》的《不二》等还有各种不同的具体的学术分派。至汉初，司马谈分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派。除了学术分类、思想分派之外，在刘氏父子之前，已有《诗序》、《书序》、《吕氏春秋·序意》、《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及张良、韩信之次兵书，杨仆之撰《兵录》等，在图书的序录或编次方面作了尝试。刘歆综合《别录》所著的《七略》，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六分天下学术，部次群书篇目，序刊古今著作共五百九十六家，

① 《汉书·艺文志总叙》。

② 《七录序》。